

【当代政治】

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整体性与层次性论析^{*}

谢海军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结构呈现出整体性与层次性特征。矛盾结构的整体性表现为不同矛盾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协同性和系统性增强,矛盾结构的层次性表现为不同矛盾要素在不同领域发挥独特功能并形成合力效应。当前,既要注重矛盾整体性治理,形成不同矛盾要素治理的合力,又要突出矛盾治理中的关键性和全局性矛盾。

关键词:矛盾结构;社会矛盾;整体性;层次性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8-0007-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主要矛盾转化涉及我国矛盾的全局性变化,需要我们在观察我国社会矛盾变化时跳出以往囿于主要矛盾范畴的窠臼,从矛盾结构的整体性和层次性两个维度上进行分析,既要抓住矛盾的关联性、协同性特点,从矛盾整体性上处理社会矛盾;又要区分不同矛盾要素在矛盾系统中的独特功能,分清主次、有的放矢地解决重点和主要矛盾。

一、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整体性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社会矛盾结构也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结构不是局部、单项的变化,而是整体性、系统性和集成性变化。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话语的提出,都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结构整体性特征的回应。

1. 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关联性增强

矛盾关联性是指不同矛盾要素之间互为条件、相互嵌入、相互影响。要解决某一项矛盾,必然会涉及其他矛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通过经济发展来全面、有效地带动其他矛盾解决的线性时代已经过去,不同矛盾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逐渐增强。

其一,从矛盾宏观结构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不同要素的横向关联性增强。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政治参与、文化需求、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存在某些矛盾,而要解决某一方面的矛盾,必然涉及其他方面的矛盾。就改革而言,任何一项领域的改革都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协同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密切联系、相互交融,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②

其二,从矛盾的微观结构看,基层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多个部门的相互配合。现在,基层社会矛盾解决的难度很大,当某一个社会矛盾发生时,多个部

收稿日期:2020-05-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变迁及构建研究”(19ZDA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矛盾‘微治理’研究”(17BKS075)。

作者简介:谢海军,男,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 450001)。

门需要协调解决。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在治理基层矛盾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不同部门相互扯皮、推诿的现象。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 and 攻坚期,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要吃掉这些硬骨头,往往会牵扯到许多部门的利益,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

2. 我国矛盾结构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协同性凸显
矛盾之间的协同性是指不同矛盾要素的变化,都必须以其他矛盾相互配合为条件,否则,任何领域的矛盾治理都难以达到最优化效果。

其一,从矛盾结构中最关键的两个要素来看,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只有协同发力,才能达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化效应。在我国社会矛盾结构中,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所有矛盾中最基础、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性的两个矛盾。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实践证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只有高度重视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并加以解决,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其二,从矛盾结构的层次上看,矛盾结构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维度的协同性凸显。在矛盾结构宏观层面,需要侧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矛盾结构中观层面,需要创新体制机制,疏通矛盾治理的“中梗阻”;在矛盾结构微观层面,需要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疏通“微循环”。在改革的过程中,要统筹协调矛盾结构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否则,将会导致我国矛盾治理结构的失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③

二、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层次性特征阐释

矛盾结构的层次性是指不同矛盾要素在整个矛盾体系中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形成矛盾功能结构的不平衡性。这些不同功能存在内在关联性,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矛盾功能闭合系统。

1. 基本矛盾在所有矛盾中起着源头性的动力源作用

在人类社会的所有矛盾中,基本矛盾起着源头性、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

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从这一点讲,基本矛盾在矛盾结构中起着动力源的作用。基本矛盾与其他矛盾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其制约着其他矛盾的性质与属性,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是基本矛盾属性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因此,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矛盾,必须从解决基本矛盾入手。

2. 主要矛盾在矛盾功能结构中具有化解矛盾的牵引力功能

主要矛盾是基本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体现和反映,其在矛盾的形成与治理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主导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能够准确分析纷繁复杂的矛盾体系并善于解决主要矛盾,通过解决主要矛盾来带动其他矛盾的化解,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这等于抓住了“牛鼻子”。只有准确判断并妥善解决主要矛盾,其他社会矛盾才能迎刃而解。

3. 次要矛盾在我国矛盾结构系统中会起反向作用

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就是次要矛盾。虽然次要矛盾作用的发挥受制于主要矛盾,但次要矛盾与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制约与被制约、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次要矛盾对主要矛盾的作用有反向影响,甚至在特定条件下与主要矛盾发生相应的转化。进入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导致次要矛盾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一些属于次要矛盾的内容被纳入主要矛盾范围。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来看,主要矛盾的内涵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方面,而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矛盾处于隐形状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划入次要矛盾范围。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拓宽了主要矛盾的内涵结构,把一些领域的本属于次要矛盾的内容,作为主要矛盾的内涵结构。由此可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会互相转化的。

4. 其他矛盾在矛盾结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旧的矛盾解决了,新

的矛盾又会产生。除了上述矛盾要素之外,现阶段我国矛盾结构中还存在大量的其他矛盾。如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矛盾,管理落后与创新社会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分散在各个领域,在矛盾结构中也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

人民内部矛盾在当前广泛存在,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基本上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虽然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敌我矛盾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矛盾结构中的地位不能被忽略,如果处理不当,必然会影响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解决。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重要讲话,指明了解决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途径。新时代,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并妥善处理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唯其如此,才能顺利解决主要矛盾。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治理的若干路径

完善新时代我国矛盾治理的路径,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新时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为主轴,深入分析我国社会矛盾结构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一方面,把握矛盾结构的内在关联性,从矛盾结构整体性上提出矛盾治理的综合性措施;另一方面,抓住影响矛盾结构的关键性、全局性问题和主要矛盾要素,关注矛盾结构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牵住矛盾治理的“牛鼻子”。

1. 构建社会矛盾治理的合力和协同机制

针对我国社会矛盾结构出现的整体性、结构性等特征,我们必须改变过去侧重解决单一矛盾要素而忽视协同治理有关矛盾的倾向,构建矛盾治理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使矛盾各种要素在矛盾治理过程中发挥合力作用,从而达到治理效能的最优化。

其一,在矛盾治理理念、主体、策略和方法上树立系统性思维。一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矛盾治理理念。矛盾治理理念事关长远、根本和全局。当前,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作为一根红线

贯穿社会矛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一切矛盾治理的风向标和指挥棒,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作为社会矛盾治理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否增强作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评价尺度。二是实现矛盾治理主体多元化。在治理主体上,党委、政府、群众、社会组织要协同发力、齐抓共管,避免党和政府唱独角戏,特别是要把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网格化”治理、“微治理”等各种经验纳入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制度设计中。三是实现矛盾治理策略多样化。在方法论上,“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④;在矛盾治理的战略措施上,注重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在治理手段上,要“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和法治化,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⑤。

其二,完善改革动力与发展牵引力的协同发力机制。改革是我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用非常突出。鉴于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整体性,实现社会矛盾有效治理,必须注重构建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治理的协同发力机制。通过改革为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协同治理提供动力机制,通过发展为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协同治理提供牵引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改革被赋予时代特征和针对性,聚焦于新时代完善制度建设和提升治理效能。要把握新时代我国矛盾治理的整体性,就必须注重矛盾治理结构中两个最关键和最重要要素的内在关联性。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的改革,不断为解决主要矛盾提供动力源。同时,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解决也为基本矛盾解决提供了必要条件。“我们要充分估计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长期性。没有发展,我们制度就不可能完善;没有制度变革,我们的发展就会因效率低下而困难重重。”^⑥

其三,提升新时代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协同治理效能。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治理成为我国矛盾治理的重点。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次要矛盾的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特别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交织在一起,这给我们积极化解各类矛盾带来不小的挑战。我国现代化进程尚处

于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的内生性、叠加性、互动性、衍生型、变异性等特征凸显。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黑犀牛”事件和“灰天鹅”事件等确定和不确定风险随时都有出现的可能,一些微小的次要矛盾也可能迅速传播,从而导致蝴蝶效应的产生,进而演变成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性矛盾。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提升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协调治理效能,力争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⑦

其四,在矛盾层级结构上,要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推进中观机制改革和实现微观实践创新,形成集成效应。我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单一的国家层面宏观治理或者基层社会治理都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化。因此,在矛盾治理方面,要发挥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根据我国矛盾治理的层级性,既要发挥中央的宏观顶层设计功能,又要大胆放权,发挥地方的积极作用,还要注重基层社会微观实践创新,使各个主体之间密切协同。在矛盾治理的顶层设计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矛盾治理中的总揽全局的作用,发挥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优势。

国家矛盾治理的顶层设计要转变为治理优势,也离不开基层社会的贯彻执行。只有严格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顶层制度设计“落地生根”,才能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效果的最优化。基层也可以创造性地探索新的实践模式,经过试点后,可以吸纳为国家治理的政策和制度。此外,连接国家治理顶层设计和微观治理的中间环节,主要是中观的体制机制建设。顶层制度和理念设计要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还必须有中观的体制机制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静态”制度设计通过“动态”的体制机制建设,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效能,从而避免出现“中梗阻”现象。

2. 针对新时代社会矛盾结构的层次性特征进行差异化治理

针对我国社会矛盾结构的层次性特征,必须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抓住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有针对性地进行差异化治理。在矛盾差异化治理中,既要发挥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

关键性、全局性作用,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和其他矛盾在矛盾结构中的独特功能。

其一,在动力机制上,通过完善制度提升矛盾治理的效能。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我国社会矛盾治理完成了从政策驱动到制度建设的转换。要应对新时代各种矛盾和风险的挑战,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根本,通过完善和发展各项制度并强化制度的执行力,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矛盾治理能力。这是因为,与政策等其他要素相比较,制度在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因此,新时代在矛盾治理的动力机制上,要着重通过改革,完善上层建筑,使矛盾治理的各项制度更加完善,进而将各种治理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减少各种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增加社会和谐程度。

其二,在牵引力上,通过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高层次、多样性和差异化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人民群众的需求呈现多元化、高层次的特点,这就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在经济领域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这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新时代经济发展不能走传统粗放型的老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予发展高质量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定不移坚持,同时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⑧另一方面,要注重非经济领域社会矛盾的治理。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公平正义价值取向贯穿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比如,在政治领域,要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在民生领域,要注重解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收入分配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规范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在生态领域,要注重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其三,提升新时代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化解其他矛盾方面的主线作用。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⑨当前，我国要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群体收入不平衡等突出矛盾，让人民群众体会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同时，在解决不充分问题时，不能沿用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扩张的老路，需要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高层次、多样性和差异化需求。

其四，防范一些次要矛盾衍生为较大的社会风险。次要矛盾在整个社会矛盾结构中的功能处于次要地位，这并不表明次要矛盾在社会矛盾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特别是我国目前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中后期，工业化和信息化相互叠加，已经具备了“现代性”的风险。社会中出现的一些较为次要的社会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可能最终演变成较大社会冲突和重大事件。国家工作人员在处理社会次要矛盾时，要树立风险意识，积极防范各类矛盾，实现风险关口前移。完善社会矛盾和风险预警机制，健全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推广和完善“网格化”管理、社会“微治理”等有效治理方法。构建社会风险识别、预警、评估和处置等体制机制，在矛盾处于萌芽状态时及时进行风险识别，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避免小矛盾衍生为大的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演变为社会矛盾。

3. 奏好矛盾治理“整体性”和“重点性”的“协奏曲”

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找到的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弹钢琴”。他强调：“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⑩解决现阶段我国纷繁复杂的矛盾就像弹钢琴一样，要奏好矛盾治理“整体性”与“重点性”的“协奏曲”，发挥协同效应。在我国社会矛盾治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矛盾治理的“整体性”，运用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位一体”战略布局，从矛盾治理理念和战略上体现出矛盾治理的“整体性”工作方法。另一方面，要抓住中心工作突出“重点性”。着重把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涉及全局性、关键性矛盾作为重点，带动其他矛盾治理，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

注释

①④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15、11页。②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88、68页。⑤《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页。⑥樊纲：《制度变革与中国转型》，《全球化》2019年第10期。⑦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82、75页。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2页。

责任编辑：文武

On the Integrity and Hierarchy of China's Social Contradiction Structure in the New Era

Xie Haijun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ity and hierarchy. The integrity of the contradiction structure shows that the correlation, coordin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of different contradictory elements are enhanced, and the hierarchy of the contradiction structure shows that different contradictory elements play unique functions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form resultant effect. At present,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governance of contradictions, form the resultant force of governance of different contradictory elements, but also highlight the key and overall contradictions in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dictions.

Key words: contradiction structure; social contradiction; integrity; hierarchy